

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

刘海峰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贤能治国说或精英统治理论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莫立了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废止科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和典型事件,实际上科举是废于“时”而不是废于“制”。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尽管科举制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它曾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是中国不应忽视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科举;考试;文明冲突

中图分类号:G40-092.5;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6)04-0069-09

1905年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关系到儒家文化的消退、精英政治的转换和传统社会的终结,甚至标志着东亚古代文明的衰弱。百年过后论科举,我们不仅要看到为兴学堂而废科举的历程和现象,还应探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用更为广阔视野,站在东亚全局,或者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科举停废,便会看出一些仅仅从清末废科举本身观察不到的东西。尽管具有明显的局限和弊端,但科举制是中华文明的产物,而科举停废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

一、科举制为中华文明的产物

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是在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便产生了“举贤才”的理念,儒家理论主张精英治国,《论语·子张》载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典型地反映了孔门师生主张贤能治国的理想。按照中国古代

收稿日期:2006-06-09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3JZD0038)

作者简介:刘海峰(1959-),男,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最通行的解释,“学”指学习,即受教育,“优”指优秀,“仕”即做官,也就是学习优秀者便去做官。反过来理解,就是做官要经过教育和学习,学业才能不优秀者则不应为官。这种读书做官论的标准在于学识之优劣,而不在于出身高贵与否。

《论语·卫灵公》还记有孔子另一句关于读书做官的名言:“学也,禄在其中矣。”一心向学、学业优秀就会有禄位官职。在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以贤任官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王霸》还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这一观点,则更是明确地提倡政权开放、社会阶层上下流动。中国传统社会奉儒学为经典,尊孔子为圣人,科举制正是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政治政府付诸实践的结果。

除了儒家以外,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诸子百家也有一些人提出过贤能治国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墨子的“尚贤”理论。在《墨子·尚贤》篇中,集中收集了他关于尊尚贤才的观点,如:“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在墨子看来,尚贤举人的标准不能依据一个人的血统和家庭背景,有才者可以从贫贱的下层进入社会上层成为政府官员,无才者则使其抑废为下层民众。从此观点出发,墨子提出了一个颇具民主色彩的“尚贤”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1]这些思想家关于贤能治国的学说,也有助于打破世袭贵族体制,他们主张人们生来具有为官或为民的各种可能,国君必须任用贤才来治理国家。这种贤能治国说或精英统治理论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科举制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

正是因为有“举贤才”、“尚贤”和学优则仕的观念,从汉代开始,实行了察举制度的实践,并在考察推荐中逐渐加入了考试的因素。而为了防止选举人才中的弄虚作假,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2](P209),考试在选士中的成分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科举制的出现。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建立进士科举之后,经过发展和逐步完善,到宋代,科举制已成为一种“至公”的制度。在明代,人们甚至认为:“我朝二百余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3](P1604)而清代科举制度为保证考试公平、防止作弊,其复杂严密程度更是登峰造极,可以说没有研究过科举制的人无法想像它的严密精巧,研究过科举制的人无法忘却它的严密精巧。

这种不分贫富贵贱的考试竞争制度,在16-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看来十分神奇和先进,也被许多西方学者所肯定。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一书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谈到科举时说: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尽管有其缺陷,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其他任何制度更大的作用。”^[4](P42-43)日本学者原胜郎在20世纪初也认为:中国千余年来进行科举考试,历朝逐次加以改良,决非可以嗤笑之物。就通过公开考试广泛选拔人才而言,中国文明可以说远远领先欧美各国,科举制度造就了中国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顶峰。^[5](P317-321)科举制是中华文明的产物,或者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又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谈到中国的科举制时说:“这些官员是经由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所选举出来的。这个方法柏拉图将会很感兴趣;虽然这个方法已经失败,今天已不再采用,但是柏拉图一定会因为中国有这套办法而喜爱中国。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作官的机会,但只有那些适合作官的人才有机会作官。事实上,这个方法实施一千多年来,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6](P196)威尔·杜兰特还指出:“这个制度是有缺点的,凡由人类所构想和推行的政府机构有那个没有缺点呢?所以,这个制度的缺点是人为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至于世界其他各国的,则比中国的还差呢!”^[6](P199)

科举制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据李约瑟夫妇和顾立雅的研究,科举制甚至可能还在 12 - 13 世纪传到阿拉伯世界,影响到中东医师职业考试制度的建立。[7](P17 - 24)[8](P379 - 395)正是因为考试选才具有合理性和先进性,所以近代以后,欧美许多国家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录用制度。西方汉学家中一般都赞成科举西传说。例如,美国学者贾志扬在其《宋代科举》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指出:“宋代考试的重要性超出中国之外,因为中国考试本身具有相当的世界史的意义。西方传统诸如民主、人权的自由的中心在欧洲和美国现时在世界各地一再被确认。很少有人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另一个普遍特征——学校和考试不但用于教育青年人,并且在选择员工和区分地位中起关键作用——发源于中国,并非西方。拜耶稣会员和其他晚明和清朝的观察家之赐,‘精英政治’的中国模式为启蒙哲学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模式,并帮助铸造了现代西方社会。”[9](P3)

1972 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在展望 21 世纪的对话中曾谈到:“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两千年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但它同样是有限度的。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10](P275)汤因比也明确肯定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曾效仿中国的科举制。

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国人不断学习西文、西艺、西政、西学(西方思想学说),中国许多现代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基本上是由西向东的单向传播,而科举制被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是少有的反向传播的例外,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对世界影响的最突出的事例。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我认为,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11]

过去已有一些人将中国发明的某种东西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如说汉字是“第五大发明”,中医的经络理论是“第五大发明”,等等。不过,这些“第五大发明”都只是中国人自己说说而已,总不免有点“自卖自夸”之嫌,因为这些东西并未被世界普遍采用,西方人也不这么说。将科举制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并非为了凑热闹或耸人听闻,而是有充分的根据和理由的。

对于否定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大发明的怀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追问: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的发明,除了科举,谁还能举出其他被西方或世界所广泛取法的制度?如果举得出,那我将感到很高兴并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更加自豪,并很乐意改变自己的看法。如果举不出,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些西方学者的说法:科举考试制度的发明,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二、科举的考试内容与制度实质

什么是科举?科举就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或方式。科举制度非常复杂,1300 年中国科举史上也有诸多变化,它可以是唐代选拔数学和法律人才的明算科和明法科,也可以是考经学和文学的明经科和进士科;它可以是明清以八股文为主要考试内容的古代考试制度,也可以是 1902 年到 1904 年间主要考中西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知识的近代考试制度;它可以是李自成大顺政权以策论为主要考试形式的考试制度,也可以是太平天国以《旧约》、《新约》和《天王诏书》等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考试制度;它可以是以满蒙文字为考试内容的翻译科,也可以是清末以内政外交理财等为考试内容的经济特科,……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科举制的实质,就是一种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你不能说明清考八股文的科举才是科举,而唐宋时期考《九章算术》等内容的明算科和 1901 年改革考试内容以后的科举就不是科举。因为考试内容和题

型可以变化,它不是科举制度的实质所在。通过考试来竞争择优,这才是科举制的根本特征。

为了让人们理解科举的概念,我们可以用船来做比喻。什么是船?船就是一种漂浮于水上的运载工具。不过,具体的船是各种各样的:有独木舟,有古代的木制帆船,有近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铁甲船,也有现代的万吨巨轮和航空母舰……然而,船最根本的共性,就是无论其大小、形状、动力如何变化,都离不开在水中漂浮行驶这一特征。

“中华帝国后期的科考制度并非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顽石,它是一个有效的文化、社会、政治和教育系统,满足了明清官僚政治的需要,有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12](PXX)}只是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遇到了空前难于应付的强有力的挑战,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科举制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再好也终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

本来科举只是一种考试选才的方式,但到后来,科举制承载着选拔治国人才、促进民间教育、维护社会公平、维系社会秩序的重任,利害关系重大,因而成为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和焦点。当科举竞争过于激烈之后,各种弊端日益突出,终于“载不动,许多愁”,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过,我们不能说船体已经开始腐朽的船(正如清末的科举)才是船,而其他各种功能齐全的新船(如唐宋的各种科目)不是船。科名中包含着“黄金屋”与“颜如玉”,利益所在,许多人趋之若鹜,沉迷于其中。由于过度拥挤,导致科举这艘大船甲板磨损加快,加上年久失修,到清朝末年时,古老的科举制终于腐朽没落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人类社会还是离不开船,离不开考试制度。

说到底,科举就是一种通过考试竞争来选拔人才的途径或工具,怎么用、谁来用效果可能不一样。这有点像船,既可以为广大善良的百姓所乘用,也可能搭载强盗。但不管其被谁使用,最早采用或制造船作为水上的运载工具,就是一大发明。科举制也类似,既然中国在世界上最早采用科举考试(至少是笔试)选才的方法,而且为后来许多国家所借鉴,因而就是一大发明创造。

科举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的利弊和影响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它既有巩固统一与维护公平的作用,又有铲除异端与压抑个性的后果;既有规范入仕与澄清吏治的一面,也有做官第一与片面应试的一面;既有普及文化与鼓励向学的功能,也有影响科技与知识偏狭的弊端……确实是科举制的局限和缺点谁都无需否定,确实是科举制的贡献和优点谁都无法否定。

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剑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科举制的局限和消极影响十分显著,但其功能和积极作用也十分强大。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对科举制的利弊得失,应本着冷静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只是过去一味地将科举视为可恶的、腐朽落后的取士制度,对科举弊端的批判连一般受过义务教育的都已耳熟能详,我们现今要纠正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因此有必要对科举制的正面意义强调得多一些。说到底,科举通过考试选才,遵循的是能力本位或才学本位,代替以往的权力本位或家庭本位,具有足以让人称道的先进性,所以考试在中国古代才会被称之为“量才尺”。

三、文明冲突背景下的科举革废

由于清末废科举时对科举的评价以偏概全,科举制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已形成了坏印象,现在要还历史本来面目,需要澄清许多误解。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科举并非传统社会的

万恶之源。科举被废,主要不是因为其制度太坏,而是因为后来科举考试内容不适应时代的需要,特别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但是,经过1901年的洗心革面,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和文体几乎是脱胎换骨了,以往人们认为很坏的八股文已不存在,说科举制很坏的主要理由也已消失。只是由于科举的向心力太大,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在西学东渐和外来势力强力介入的情况下,科举制的废止实际上是清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在主张为科举制平反的论著中,我虽然引用过从梁启超到现代学者不少否定废科举的言论,但自己却从未直接否定过废科举这一历史事件,且向来认为科举制在近代的衰废,是因为社会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举制已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因此,科举制的终结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在,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废止科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和典型事例。具体地说,当时这种文明冲突包含基督教文明与儒教文明的冲突,以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

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导致清末废止科举的各种原因中,除了中国人自己为兴办学堂而搬掉科举制的障碍以外,还有一股外来势力,为科举革废推波助澜。〔13〕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中国的儒家文化或儒教文明是以科举制作为制度支撑的。近代以来,基督教文明要想真正渗透到中国,势必与儒教文明发生冲突,而对广大中国士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科举制,是传播基督教的最大障碍。在清末批判科举的浪潮中,一些来华传教士也发出改革科举的呼声,其中有的是出于好意,有的则动机可疑。当强势的西方文明借助军事力量东渐之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显得文弱无助。当科举制承载并以之为动力的儒教文明遭遇西方列强的冲击之后,科举制也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科举制废止之后,维系儒学的制度支撑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礼崩乐坏,使传教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空间,因此对废科举一事,最高兴的可能是当时部分西方在华传教士。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圆明园被外国侵略者烧毁现在仍广为人知,但今天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八国联军曾烧毁北京贡院,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科举制走向衰废呢?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说,北京贡院的被烧毁对当时中国人心理的影响并不亚于圆明园的被毁。圆明园确实壮丽辉煌,但它毕竟只是皇帝的游乐居住的行宫,一般人根本无法窥其堂奥。而北京贡院则是举行顺天乡试和会试的所在,为全国广大士人所知晓。清末各级要员尤其是汉族重臣,多数都有过在北京贡院的考试经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据说是德国侵略军将贡院烧毁,当时还引起许多士人的愤怒。北京贡院的格局和规模非常大,当时德国人应该是蓄意烧毁北京贡院。因为此举对中国士人的心理影响非常之大,而从1901年订立的《辛丑条约》中特地规定不准闹义和团的地方士人参加科举五年的附加条款来看,当时外国列强是深知科举对中国士人的重要性的。

当时居住在北京的英国人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指出,八国联军入京后,贡院中“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都被盗窃一空”。“这种举国上下对科举考试的强烈迷狂恐怕比我们对德比的狂热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以想见,因为排外的1900年动乱而导致的惩罚——5年之内禁止在直隶省首府北京和邻近的山西省府太原举行会考——对人们的打击有多沉重了。在其他8省,禁止会考一年,只有7省允许照常会考。这样一来,被禁止会考的省份的士子因无法去其他省份参考而只有耐下心来等待,如果忍得住的话。至于取得做官的资格,则要等得更久,因为考试之后通常也会有漫长而不定的等待期。这就是欧洲各国的政府为他们的子民被杀害而施加给中国人的惩罚的一部分。”〔14〕(P230-232)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追问:如果将科举看成是一个罪恶的制度,凡是有利于废科举的举动都该受到称赞,那么八国联军烧毁北京贡院、《辛丑条约》强制停禁部分地区的科举,是

按文中“德比”指一年一度的赛马,“会考”应当译为“乡试”。实际情形是1901年补行庚子(1900年)恩科乡试,只有甘肃、广东、广西、云南、贵州5省举行;1902年另外12省补行乡试。

不是也该加以肯定呢？

虽然德国汉学家傅吾康认为《辛丑条约》对科举制的废除没有任何影响^[15](P67 - 68),但我认为,实际上庚子事变对清朝统治者的触动非常大,对后来慈禧下决心改革和废除科举至少有间接的影响。八国联军火烧北京贡院和《辛丑和约》中对中国部分地区科举的打击,其冲击效应之大,甚至影响到整个科举制在四年后被废止。

科举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周期性,自宋代形成三年一科的定制之后,周而复始贯串各朝,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南宋建炎元年(1127)高宗开科取士诏便说:“国家设科取人,制爵待士,岁月等阴阳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坚。”^[16](P299)到了清代,科举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更强,但因八国联军的入侵,却使一贯运行有序的科举制乱了套。北京贡院被毁,致使1902年、1903年的顺天乡试不得不借用在开封的河南贡院举行,而且连1903年、1904年的会试也移到开封举行。这在明清500多年的科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借闹河南,一些科场制度也开始松动。如因顺天乡试与河南乡试合并进行,无法应付众多的入场举子,结果乡试点名搜检入场制度出现松动,不按常规进行。向来乡会试试卷都经过誊录后再校阅,但最后两科在开封举行的顺天乡试和会试竟然不再誊录,结果流传下来的只有墨卷而无朱卷。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后,科举考试时间固定为三月会试,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因1904年会试地点在开封,考虑到中式贡士无法按时赶到北京,于是展期在五月二十一日举行殿试。因为八国联军的入侵,向来正常运转的周期被打乱,考试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考试场规出现松弛,这实际上预示着科举制的灭亡。

而且,在导致1905年9月2日停废科举的袁世凯等人的《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中,也反映出对外国势力有所交代是废科举的考虑因素之一。该奏折提到:“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以化群疑而消积愤。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17](P57 - 59)联系到前述列强对科举的态度,便容易明白这段话背后所包含的深意。

在近代以前,东西方本是两个各自独立运行的文明体系。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介入,中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都很难走出古代的历史空间,可能很久都不会发明蒸汽机或自动产生共和政体。到19世纪,无论是技术还是学术方面,中国与西方已有相当大的差距,存在着相当大的文明落差。科举被废,不仅是时代变迁的缘故,实际上也是文明的不同与落差所导致的结果。

处在清末“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许多传统的制度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都逃脱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例如,书院的命运便与科举十分类似。书院在其存在的一千多年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进行教育活动的场所,虽然也有其局限,但总体而言,书院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但是,到了清末,多数书院都变成应举的预备机构,也被人们视为与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相对立的旧学的堡垒。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似乎学堂代表进步,书院代表落后,尽管有些新式书院实际上是在教育新学。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不仅奏过《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试策论折》,而且也上过《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对书院的弊端大加抨击,例如熊希龄等人所呈《湘绅公恳抚督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18](P595 - 597),便详细列举过清末湖南众多书院的各种积弊。到1901年9月,朝廷发布上谕,令所有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宣告了书院这一中国传统的教育组织形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1993 - 1994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所录便可看出,最后两科顺天乡试卷和会试卷为“墨卷”而非朱卷,但格式与朱卷同。

书院被彻底否定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负面的名词。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期间,书院在大陆基本上也是被否定的旧事物。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书院其实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它在清末被西式学校所取代,并不意味着总体上应该被否定。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较易理解为什么科举制被废止,并不意味着科举制就该彻底否定。在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有大约1240年左右的时间,科举制是适应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只有当西学东渐、国门被迫打开之后,科举制才日益与时代脱节。将科举说成是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最大冤案之一。

科举制被废止的时代,不仅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的时代。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许多传统的事物都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例如,马车被动力机车所取代,线装书被西式印刷书所取代,犁被拖拉机所取代,等等,因为在时代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社会原有的许多事物已变得落后了,被淘汰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在看待马车、线装书、犁等东西的时候,应该历史地看其价值与作用。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移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自然科学的内容,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的是先进的工业文明,已十分强调科技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便指出:“当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而带起的整个文化,被那无情的进化和历史破坏推翻时,这实在是一件最大的不幸。”^{[6](P199)}产生于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又像一艘专门为在江河(古代社会)中行驶而建造的大船,并不适合在大海(近代社会)中航行。一旦它驶入海域,遇到大风大浪,结果便遭到灭顶之灾。

四、重新认识科举制

重新认识科举制,并不是主张在当代恢复科举制——实际上时过境迁之后科举制也不可能被恢复,而是要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其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清末将科举制打翻在地,1949年至“文革”中,还再踏上一只脚,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受以往思维定势的影响,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因为科举制是一个坏制度,所以当时才会被废除;如果科举制不是很坏,怎么可能被废除呢?但有一个道理,需要仔细思考和辨析才容易明白: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当离清末的时空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便越来越能够认识这一道理。

确实,我们不要动不动就以西化后的现代的尺子,去度量中国古代的民族的历史。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传统,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古代东方的事物,往往观察到的尽是落后、黑暗。如果都像过去那样否定孔子连同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关重大的儒学,否定科举及其选拔出来的百万举人和十万进士,中国历史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呢?大概给人的印象便只有阶级斗争和“吃人”的历史。今天,我们看待科举制,应该具有一种“理解之同情”的心态。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篇首中所说的:“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19](P1)}

中国人对科举历史不一定要否定才显得进步。科举被废,并不是考试选才制度很坏,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必然结果。实际上,科举是废于时而不是废于制。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李弘祺便曾感慨:“科举制度是因时代而失败的制度,并不是因为其本身而失败的制度。”[20]

没有最完美的制度,只有最合适的制度。科举是有许多坏处,但它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科举是有许多弊端,但你能举出古代比科举更少弊端的其他选拔方式么?理论上说存在最理想的取士制度,现实社会中却只能实施最可行的选才制度。因为理论上正确的不一定是可行的,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科举是有许多缺点,但古代中国人虽然经过多次努力和反复对比实践,却还是无法找到一个比科举缺点更少并且可行的制度。

当代学者对科举制的评价总的来说已越来越冷静和客观,越来越理性和公正,基本上出现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一些不研究科举的人仍觉得科举很坏,而研究科举的人往往发现它并不太坏。深入研究科举者基本上是对科举肯定较多者,而对科举激烈批判和嘲讽者基本上是不研究科举者。批判科举一点也不困难,一般读过初中的人都可以谈出点道道来;而在还存在大批批判习惯的情况下,要肯定科举制则相对不容易,既需要提出充分的根据,还要有一定的学术勇气。

事实胜于雄辩。在科举制废止百年之后,我们不要还是只会笼统地讽刺和抨击科举制,我们需要的是有理有据的讨论和商榷。例如,要指责科举不能选拔优秀人才,甚至只会扼杀人才,就应该举出可靠的论据,最好也用实证的方法来反驳为科举制平反的论点。因为即使是在科举制的晚期,清代进士出身的优秀分子还大有人在,谁有办法否认纪晓岚、张之洞、翁同和、康有为、蔡元培等人不是优秀人才呢?

1894年,模仿中国实行了近900年的韩国科举制在外敌的入侵下被迫废止。与中国科举史相当类似,韩国科举在充分发挥选拔英才的功能、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的同时,也一样出现了许多弊端,韩国历史上的大儒丁茶山甚至认为,韩国科举有十个方面不如中国科举。尽管韩国历史上不时有关于科举存废利弊的争论,也有许多人批评科举制的弊端,但现代韩国人在看到科举制消极作用的同时,也充分肯定科举制的积极作用,并将科举文化视为韩国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来对待,因此,1994年韩国才会在废科举百年之际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此后,在汉城还长期设有供人们参加的模拟科举考试。而经过多年以偏概全的宣传灌输,许多中国人对科举的坏印象却根深蒂固,在有的人心目中,科举不啻于妖魔鬼怪,一旦看到为科举制平反的说法,便大惊小怪,惊呼曰“为科举招魂”。若这些人看到韩国人在1994年纪念废科举百年时身穿古代儒服再现科举盛况的场景,恐怕更要惊诧友邦科举“魂兮归来”了。

现在韩国每年还在成均馆大学和一些地区举办纪念科举的模拟科举考试,作为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与中国对科举的看法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此,我想到类似于2004至2005年争论过的端午节这一节庆文化遗产的归属问题,作一个但愿不会发生的假设:如果中国继续将科举看成落后腐朽的丑恶制度,一直加以唾弃,而当有一天将科举文化视为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的韩国,将其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获批准的时候,不知广大中国人又该作何感想与反应?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东西方文化了解的加深,相信国人会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清朝末年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被时代所淘汰的科举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主体内容之一。尽管科举制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曾在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是中国不应忽视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 吴毓江. 墨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 [2] 葛洪.抱朴子:外篇第 15 卷·审举[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3]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 84 科试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M]. Edinburgh and London, 1896.
- [5] 宫崎市定.科举史[M]. 东京:平凡社,1987.
- [6]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第 1 卷(4)·中国与远东[M]. 台北:幼狮文化出版社,1978.
- [7] LU GWEI-DJEN. *China and the Origin of Qualifying Examinations in Medicine, in Joseph Needham,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8] Herrlee 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 [9] 贾志扬.宋代科举·中文本序[M].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 [10]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 荀春生,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 [11] 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J]. 中国社会科学,2001,(5).
- [12]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13] 刘海峰.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废[J]. 学术月刊,2005,(11).
- [14] 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我的北京花园[M]. 李国庆,等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15] WOLFGANG FRANKE.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M]. Harvard University,1960.
- [16] 文献通考:卷 32 选举[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7] 光绪政要:卷 31 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M]. 上海:崇义堂,1909.
- [18] 戊戌变法:第 2 册[M]. 北京:神州国光社,1953.
- [19]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0] 孟汤:科举废止前后[N]. 南方周末,2005-10-06.

[责任编辑:洪峻峰]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LIU Hai-feng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ES) is a world-famous and highly influential heritag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theory of “governing the state by the talented and virtuous” or “ruling the state by the elite” i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is system. In a sense, IES could be regarded as China’s “fifth invention”. Around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bolition of IES was an inevitable result and a typical case of the conflic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t is argued that IES was abolished more because of that special time than because of IES’s own problems, and that the abolition of IES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time and history does not mean that IES should be denied for ever. Despite its numerous limitations and defects, IE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ES is a cultural heritage well worth treasuring.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examination,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